

社会主义财政问题讲座

第 一 辑

(内部试用教材)

江西财经学院印

一九八一年五月

《社会主义财政问题讲座》

第一辑

目 录

- 一、遵循经济规律 做好财政工作**.....许 毅(1)
 - (一) 总结历史经验, 研究客观规律, 发挥财政职能的能动作用..... 1)
 - (二) 财政分配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做好综合平衡工作.....(17)
 - (三) 关于企业经济核算同自主权问题.....(29)
 - (四) 谈谈税收的杠杆作用.....(46)
 - (五) 关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68)
- 二、关于财政管理体制问题**.....金 鑫(83)
 - (一) 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史和基本经验.....(85)
 - (二) 我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及其矛盾.....(110)
 - (三) 财政体制的改革.....(128)
- 三、谈谈会计基础知识**.....杨纪琬(155)
 - (一) 什么叫会计? 会计是一门什么性质的科学.....(156)
 - (二) 社会主义会计的作用和任务.....(166)
 - (三) 三十年会计工作的回顾.....(171)

(四) 会计的分类·····	(176)
(五) 会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182)
(六) 财务计划·····	(193)
(七) 记帐方法·····	(201)
(八) 企业的资金管理·····	(208)
(九) 成本利润和利润的分配·····	(219)
(十) 会计报表·····	(228)
(十一) 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	(231)
(十二) 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	(235)
(十三) 学习外国会计经验·····	(241)
(十四) 会计制度的建设·····	(249)

遵循经济规律 做好财政工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同志在江西财经学院
全国县局级以上财政领导干部训练班上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月

第一讲 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客观规律， 发挥财政职能的能动作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不是口号，而是行动的指南。实践是社会的实践，群众的实践，不是指一个人一个局部的经验。

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要通过实践的探索过程和学习研究的过程。这是一个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的过程。

毛主席指出：“从不认识到认识要经过实践的过程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人们要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而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态度，而且必须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的胜利和失败，并且进行认真的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也是不行的。”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三个“必

须”两个“反复”一个“认真”。这使我们认识到理论的东西、概念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是要通过对一系列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进行认真研究之后才能认识的。

对于财政职能作用的认识也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国家组织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手段，是国家职能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经济杠杆。

建国卅年来，财政在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前提下，肩负着调节阶级利益，合理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组织综合阶级利益，组织综合平衡，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巩固国防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因此，要做到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做好财政工作，发挥财政职能的能动作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客观规律。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打倒“四人帮”这个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打倒了“四人帮”不等于就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如果不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实践结合好，四个现代化还是会落空，再走弯路的。所以，我们必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打倒“四人帮”两年多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各条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的恢复也比较快。

形势是很好的。但是，必须看到，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四人帮”的流毒还在那里作怪，有些是反映我们对客观经济规律还没有认识清楚。我们还没有取得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譬如说，在基本建设问题上。投资多、战线长而效果小；在工资与奖金问题上，经过拨乱反正，前年提了工资，去年发了奖金，然而许多地方又出现了新的平均主义和长官恩赐的现象，而没有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又如，我们反对按长官意志办事，提倡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办专业公司，这当然是好事，然而我们看到的专业公司有些实际上还是一个行政机关，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行政层次；再如，引进外资和新技术，这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利条件，然而有些技术引进，缺少全面周密的规划，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反而使我们自己背上了包袱。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改革，但对调整不热心，要求消费上去，积累却不肯下来；在基建上，要求短线上，长线却不肯下来；要求国家收入分配构成上加以改变；要求财政放权，要求提高折旧，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却又忽略了国家的整体需要和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要改革、要学外国，却忘记了自己国情。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呢？大家想大干快上，想起飞，但为什么飞不起来呢？经济上发生这些问题同财政的职能作用在人们的认识上不充分或不完全是有关联的。卅年来，财政情况的正常与否正象镜子一样，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健康与否。从这个历史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财政这个体现国家职能的工具运用的好与不好，对促进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关系极大。

下面我按历史发展顺序作一些回顾，以便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

叶副主席说：“我们既要正视过去的失误和挫折，又要充分估计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估计我们在战胜困难和挫折中所取得的胜利。”

“卅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就是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现在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经济学界和财经各部门的同志在致力于总结历史经验，讲求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改革财政经济管理体制，提高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自觉性。我想着重探讨一下我国国民经济两起两伏的经验，目的是为了找出症结，寻求改革方案，以利于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1. 恢复时期的伟大成就和第一次失误。

国家刚解放的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当时，市场混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并且发生了美帝的侵朝战争。因此，面对当时国内外的现实状况，毛主席、周总理提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同时还需要做好八项工作，其中两项工作是同我们密切关联的。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

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顺利地达到了“边稳定物价，边抗美援朝、边建设”的目的。

我们在财政上贯彻执行了“统一财政，加强税收、合理负担”的政策。在税收上，沿用了革命根据地的税制，并采用了国民党时期的部分旧税制，如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当时，私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我们在税收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官僚资本，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虽然我们的国营经济比重还不大，但在国民经济中却起到了领导作用，限制了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了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三年中间取得了财政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顺利地转移到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上来。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第一次战略转移。

但正由于财政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就，财政预算有了一些结余，于是有人认为可以动用这笔结余来多搞点基本建设。同时看到流通中占用的资金多了一点，为了多筹点建设资金，搞了商业“泻肚子”。这一年的基建投资比上年增加了廿二亿七千万元，增长了51%。结果预算出了赤字，货架子东西少了影响了市场，那时工作谨慎，见事快，及时采取了措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大区竞作贡献，当年就把问题解决了。

这次的经验表明，基建冒不得。预算结余已通过银行信贷方式提供给企业补充了流动资金，特别是商业部门流通资金。

所以压生产流通资金来搞建设，不但基建上不了，生产流通也要受到影响。为此，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次全党取得的经验教训，集中了大众的智慧概括为“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的著名论断。

这是建国以来取得第一次伟大胜利之下发生的第一次失算。

2. “一五”时期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五六年的第二次失算。

“一五”时期经济建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广大工农群众在解放后进发的高度革命热情。这方面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从经济方面看我认为主要原因是：

(1)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积累和消费比例安排适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这一时期，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积累率占国民收入的24%，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0.9%，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8%，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5%，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2.3%，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平均每年递增22%，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递增21.6%，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每年平均递增8.7%，职工工资水平每平均递增7.4%，五年中平均每个职工提升了一级。以首钢为例，1953年提级面为26%，1954年为13%，1955年为17.6%，1956年为54.4%。农民收入每年平均递增5.1%。这个时期的生产和建设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的增长速度是比较相适应的。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是比较高的，这种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2) 国家制订了以156项重点项目为中心的中长期计划，规定了农轻重的比例，从而使全国上下有了个统一的奋斗目标，统一了行动。156项从计划制订到实施都是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尊重专家。富春同志亲自选择比较方案，亲自勘察工地、基本建设严格按照设计程序办事，先勘探后设计，先设计后施工，建设银行实行了“三算”（即设计有概算，施工有预算，竣工有决算），“四按”（即：拨款按计划，按设计，按预算，按进度）的财务监督制度，建设单位、建筑企业都实行了经济核算制，这个时期的投资达到了高效果，新增固定资产占投资的83.7%。

(3) 企业普遍建立了经济核算制，实行了清产核资，搞了定员定额，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初步形成了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四者利益结合的体制：对职工能计件的采取了计件工资制，不能计件的除固定工资外采用了各种形式的奖金制度。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从计划利润中提取3.5%、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12%—20%的企业奖励基金（当时一般称之为厂长基金）用于职工的福利和奖励，但缺点是为了争超计划分成，对计划指标的争执较大，故有“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的说法。

至于企业发展生产、改进技术和更新改造费用，当时采用四项费用（即零星基建、技术措施、劳动保护措施、新产品试制）拨款形式。企业自主权很小，所以那时有二百元厂长、五百元厂长之说，（即固定资产标准分不同行业规定为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上，购买固定资产要报上级批准）。但由于当时国家规定主管部门可以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40%的分成，（当

时一般称之为部长基金），主管部可以用来调节企业发展生产基金的不足。这时的经济核算制虽然还说不上完善，但总的说来四者利益的结合是比较好的。所以企业经济核算也是搞的有成效的。

（4）从物资管理体制来看，国家统管和部管物资，当时采取订货会议的形式，虽然是计划分配的但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建立了合同制，大众物资是直接供货的。三类物资由于品种多，供需难以统一分配，当时是由下面管的，实际上也就是类似市场调节的性质。它的缺点是条条、块块之间调节比较困难。但由于资金与物资保持了相对平衡，所以基本上是保证了基建和生产的正常需要的。

总的说来，“一五”时期虽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但实际上是在中长期计划指导下，实行的是权责结合的，分级管理的体制（主要是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建设单位）。同时对客观经济规律比较尊重，党的作风好，自觉遵守纪律也好，职工政治觉悟比较高，加上在处理国家、部门、企业、职工四者利益上结合得也比较好，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进行了总结，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了主要是对农轻重、沿海与内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等方面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得完全恰当。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刚刚建立，它同生产力的发展还有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指出要找寻恰当的交换形式和正确处理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因此，在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开展了讨论。

一九五六年，由于对私改造的胜利完成，当时想加快一点步伐，于是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增加得多了一点（比上年增加59%），从占财政支出的30.2%上升到45.7%；职工人数和工资也增加多了一点；为了加速农业生产，对农贷也多放了一些，加上生产资料调价，以至财政发生了赤字，市场也较紧张。这就引起了总理和陈云同志的注意，及时总结了经验，纠正了这种急于求成的倾向，陈云同志提出了三大平衡的理论。薄一波同志也研究了积累不得超过国民收入25%左右，财政收入不得超过国民收入30%左右，基建投资不得超过预算支出的40%左右的规律问题。一九五七年的计划把积累和消费比例调整合适了，进行了综合平衡，于是一九五八年初出现了跃进的形式。这个时期在财政体制上也作了相应改革，大批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对企业实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并实行了小型技措贷款，企业财权比“一五”扩大了四倍（主要是四项费用），基建投资试行了投资包干。

那时，由于有了远景规划，比例合适，体制有所改革，人心安定，精神振奋，生产上升很快，在经济核算方面创造了不少好的形式：如生产企业中创造了本票核算形式和资金分管的经验，专业核算与群众核算相结合的经验，大大地发展了企业经济核算制，正确处理了企业内部供产销关系和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众性班组核算的普遍建立，创造了工人参加管理、参加核算等企业科学管理的新形式。

在物资管理体制上，一九五八年初，上海等地也摸索出一套新的形式，即组织地区性的调剂，打破了条条、块块的限制，短线物资、零星物资组织到物资公司供应，统一调节余

缺，多余物资能够迅速处理，不足的能得到保障，因此企业的库存量最低的压到三十天左右。应当说，我们有了两次经验教训，并从中提炼出了规律性的原理，具备了少走弯路，不走弯路的条件。

3. “大跃进”时期的三年国民经济受到大挫折的原因

由于一九五八年初出现了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大好形势，于是大家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并且越来越膨胀，把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国民经济跃进形势归结到政治因素上去了，即归功于反右斗争的胜利。到南宁会议提出了反保守、反右倾，把五七年的稳定发展当“马鞍形”来批，把本来正确的三大平衡当作“消极平衡”来批，把本来是反冒进带来的五八年初跃进局面作为反右斗争的成果来肯定，更使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情绪日益抬头。把毛主席总结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十大关系的理论，把陈云同志总结的三大平衡的理论，薄一波同志总结的二、三、四规律，把总理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提出的“二五”计划规定的25%积累比例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统统冲破了。加上陈伯达、张春桥一伙鼓吹取消商品、在党内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盲目乱干的瞎指挥风、主观主义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席卷各地。提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口号，什么“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只讲需要，不讲可能，把积极平衡变成层层加码，上下左右互相哄抬的高指标。大家怕右不怕“左”，特别是五九年庐山会议把经济问题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讲，经济规律不讲，各项比例关系打乱了。结果是一九五八年积累率达到33.9%以上，一九五九年的

积累率高达43.8%，一九六〇年已经看到撑不下去了，还搞到39.6%。由于为建设而建设，把生产建设当成目的，不顾消费，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相反有所下降，以至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工业生产每年只递增3.8%，农业生产每年递减了4.3%。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九五八年下降8.5%，一九五九年下降了7.5%，一九六〇年又虚假上升到9%，一九六一年急剧下降28.8%。基建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加了一倍以上。但大中型项目投产率只有20%，新增固定资产比例下降到71.4%。从这里可以看出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积累与消费比例，不讲有计划按比例，不讲综合平衡，不注意人民生活的改善，片面追求生产建设的高速度，错把手段当目的是“二五”受到挫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核算制在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算大帐不算小帐以及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错误思潮的冲击下，极大削弱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也遭到严重挫伤。这是从企业内部看亏损增加、盈利下降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是造成危机的根源，即使有了好的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

4. 调整时期的五年经济恢复快的关键

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发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键在积累过高，基建规模过大，人民生活困难，国民经济必须调整。陈云同志提出：国家计划“首先要保证为了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必要部门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其次要保证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需要，剩余多少然后用于基本建设”的方针。毛主席、周总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首先大力压缩基本建设。一九六一年的投资比一九六〇年

压缩了三分之二。然而还没有退够，加上生产企业“五定”贯彻不力，所以整个国民经济仍然处于失调状况。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历史经验，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了八字方针。这一年，基建投资又比一九六一年压缩了二分之一左右，施工项目压缩了近百分之七十，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九六一年为19.2%，一九六二年又压到10.4%，一九六三年为17.5%，一九六四年恢复到22.2%，与此同时，坚决落实了“关”、“停”、“转”、“并”的措施，职工精简了二千万人，各条战线都强调了增产节约运动。财政银行加强了管理，发挥财政监督职能作用。所有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起了决定作用。同时抓了市场，采取了保证人民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的措施，看准这两个环节，一抓就灵。退够了真正使国民经济得到了“休养生息”，恢复了元气，当年就有了起色，一九六三年起重新纳入稳步发展的局面。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有了好转，到了一九六五年就全面好转了。这次高度集中，解决了权责一致，事权一致，钱物一致，所以产生了高效果。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工农业生产平均每年以15.7%的速度向前发展，其中工业生产每年递增17.9%，农业生产每年递增11.1%，国民收入每年递增14.5%，基本建设投资效果（新增固定资产）达到87.1%，其中一九六五年达到93.6%，创历史最好水平。这个时期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是高度集中的，企业的自主权比“一五”时期还小，但是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经济核算是好的，所以从这时期来看，积累消费比例关系安排得适当，是关键。企业经济核算的加强和一系列制度的恢复也起了积极作用。这次调正花了整整五

年时间才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可见破坏容易恢复难。

5. “三五”、“四五”时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的症结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国民经济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的破坏和历次不同的，是披上政治斗争的外衣，颠倒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煽动极左思潮，因之，它的声势更大，为害更烈。他们诬蔑六二年的调正是什么“下马风”，创造“上马”是方法问题，“下马”是路线问题的谬论。他们颠倒是非，把改善人民生活当修正主义批，把走富裕道路当资本主义批，把发展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批，致使积累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造成了城乡人民生活方面的大量欠债。

(1) 第一是破坏综合平衡，强调需要就是计划，把缺口平衡曲解为积极平衡，又把积累率提高了。“四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33%。这个时期，从一九六七年起实行了基本折旧基金下放，按规定应用于更新改造，但是，放了钱，不放物；放了事，不放权，放了权，不放责，所以实际执行中，被挪用于搞新建项目的基本建设，约占每年折旧基金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实际积累率要超过上述比例。

(2) 从这时起，国家没有编出过起指导作用的长期规划，又忽视当年的综合平衡，基建项目的安排既缺乏集中领导的权威，也缺乏国家监督，各级的头头都有权批准，因而战线越拉越长，项目越搞越多，而且提倡所谓“三边”（即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实际上是“五边”（边返工、边报废），只要头头点头，不经勘探就强迫设计机构设计，有的不经设计就施工。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虽然这十年的投资效果仍

有61.3%左右，但这些年已施工的“胡子”工程和已经建成而不能发挥经济效益或不能充分发挥经济效益的项目相当于×年以上的投资总额。

为什么投资大，效果不好呢？马克思说：“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二卷《马、恩全集》第24卷第350页）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幸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国民经济趋向崩溃边缘的症结。

（3）由于积累过高，基建战线过长，项目多因而沉淀下来的未完工程过大，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提供任何有用的效果，这就严重地妨碍了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在建工程六万多个，更改项目三万多个，两项合计十万多个，大家占用一点就把材料物资占掉。而生产企业分配到的物资一般只占计划的80%，能订到货的约占计划的80%，实际到货的只占订货的80%，加上分到的物资品种规格不对路，结果是生产企业实际能拿到的原材料只占计划用量的一半左右，同时出现了生产上不去，流动资金占用增多的反常现象。这是工农业生产上不去，发生比例失调的根本原因。

因为资金留有缺口，就打乱了资金的正常渠道，产生了化、挤、冲、摊（即：化大公为小公，挤占成本，冲收入，搞